

『骂』与《新青年》 批评话语的建构

李哲 著

主编 李怡 张中良

『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骂』与《新青年》批评话语的建构

李哲 著

主编 李怡 张中良

『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项目『民国社会历史
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框架』阶段性成果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骂”与《新青年》批评话语的建构/李哲著.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6

(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李怡,张中良主编)

ISBN 978 - 7 - 5329 - 4903 - 8

I. ①骂…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史—民国 ②《新青年》—文学研究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7575 号

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骂”与《新青年》批评话语的建构

李 哲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 - 82098776(总编室)
0531 - 82098775(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插页/2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29 - 4903 - 8
定 价 32.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总序之一

民国历史文化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可能

李怡

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是“民国”，从民国历史文化的角度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既是这一历史阶段文化自身的要求，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的动向。

中国现代史上的“中华民国”是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无论是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历史标志，还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都曾为“民国”的民主自由理想而奋斗牺牲的重要事实，“民国”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都是值得我们加以深究的。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叙史”也一直都在不断修正自己的框架结构，从一开始的“新文学”、“现代文学”到1980年代中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每一种命名的背后都有显而易见的历史合理性，但同时又都不可避免地产生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新文学”在特定的历史年代拉开了与传统文学样式的距离，但“新”的命名毕竟如此感性，终究缺乏更理性的论证；“现代文学”确立了

“现代”的价值指向，问题是“现代”已经成了多种文化争相解释、共同分享的概念，中国之“现代”究竟为何物，实在不容易说清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确立的是百年来中国文学的自主性，但是这样以“世纪”纪年为基础的时间概念能否清晰呈现这一文学自主的含义呢？人们依然不无疑问。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上，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叙史”的“民国”定位被提了出来，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民国文学史”命名的呼吁。

“民国文学”的设想最早是从事现代史料工作的陈福康教授在1997年提出来的^①，但是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2003年，张福贵先生再次提出以“民国文学”取代“现代文学”的设想，希望文学史叙述能够“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②不过响应者依然寥寥。沉寂数年之后，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的时候，终于有更多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特别是最近两三年，主动进入这一领域的学者大量增加。国内期刊包括《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海南师范大学学报》、《郑州大学学报》、《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都先后发表了大量论文，《文艺争鸣》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等还定期推出了专栏讨论。张中良先生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问题，我本人也在倡导“文学的民国机制”研究。在我看来，“民国文学”研究的兴起十分正常，它们都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之后一次重要的学术自觉和学术深化，并且与在此之前的几次发展不同，这一次的理论开拓和质疑并不是外来学术思潮冲击和感应的结果，从总体上看属于中国学术在自我反思中的一种成熟。

当前学界的民国文学论述正沿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试图重新确立学科

① 陈福康：《应该“退休”的学科名称》，原载1997年11月20日《文学报》，后收入《民国文坛探隐》，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② 张福贵：《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香港《文学世纪》2003年4期。

的名称，进而完成一部全新的现代文学史；二是为旧体文学、通俗文学等“新文学”之外的文学现象回归统一的文学史框架寻找新的命名；三是努力返回到历史的现场，对民国社会历史中影响文学的因素展开详尽的梳理和分析，结合民国文学历史的一些基本环节对当时的文学现象进行新的阐述和研究。在我看来，前两个方向的问题还需要一定时间的学术积累，并非当即可以完成的工作，否则，仓促上阵的文学史写作，很可能就是各种旧说的汇集或者简单拼贴，而第三个方面的工作恰恰是文学史认识的最坚实的基础，需要我们付出扎实的努力。

从民国历史文化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为我们拓展一系列新的学术空间。

例如民国经济形态所造就的文学机制，民国法制形态影响下的文学发展，民国教育制度的存在为文学新生力量的成长创造怎样的文化条件、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生存提供怎样的物质与精神的基础等等。还有，仔细梳理中国现代作家的“民国体验”，就能够更加有效地进入他们固有的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为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提出更实事求是的解释。

当然，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意义，挖掘其中的创造“机制”绝不是为了美化那一段历史。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漫长里程中，在我们的现代文化建设目标远远没有完成的时候，没有任何一段历史值得我们如此“理想化处理”，严肃的学术研究绝不能混同于大众流行的“民国热”。今天我们对历史的梳理和总结是为了呈现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可资借鉴的机制，以为未来中国文学的生长探寻可能——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中，我们习惯于在外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寻找我们模仿的对象，通过介绍和引入西方文学的各种模式展开自己。殊不知，其中的文化与民族的间隔也可能造成我们难以逾越的障碍。如今，重新返回我们自己的历史，在现代中国人自己有过的历史经验和智慧成果中反思和批判，也许就不失为一条新路。

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一套“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丛书，试图从不同的方向挖掘“以历史透视文学”的可能。这里既有新的方法论的倡导——诸如“民国”作为“方法”或者作为“空间”的含义，也有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新论，有“民国”下能够容纳的特殊的文学现象梳理——如民国时期的佛教文学，也有民国文学品种的崭新阐述。它们都能够带给我们对于历史和文学的一系列新的感受，虽然尚不能说架构起了民国历史文化现象的完整的知识结构，却可以说是开辟了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但愿我们业已成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能够因此而思想激荡、生机勃勃。

2014年6月，北京

总序之二

历史还原是现代文学 学科拓展的有效途径

张中良

中国现代文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属于历史与文学的交叉学科，历史品格是其立身之本。现代文学是在怎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发生与发展起来的，对传统有何承续，对当代有何影响，自身呈现出怎样的脉络等等，都需要以历史的眼光来观照。从这门学科正式确立的 1950 年代之初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观占据支配地位长达数十年之久。1980 年代以来，尽管现代文学史叙述中越来越少使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实际上这一历史观仍然在起着柱石的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的确为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代文学被阐释为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于是，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正义性与新政权合法性的有力见证。也正因为如此，研究对象只有三十几年历史的这门新兴学科，地位迅速上升，许多高校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与涵盖三千余年历史的古代文学教研室地位相当，后来又吸纳了当代文学，现当代文学

与古代文学同样属于一级学科中国文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学科队伍快速壮大。学位制度建立之后，现当代文学硕士点、博士点星罗棋布。据初步统计，从1984年到2014年，已经通过答辩的现代文学（含跨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达2000篇之多^①。

在新民主主义文学的阐释框架内，文学的政治功能与社会作用得到重视，从1920年代的革命文学到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再到抗战时期的工农兵文艺获得高度肯定；五四启蒙文学、1930年代的民主主义文学及自由主义文学、九一八之后逐渐发展到卢沟桥事变之后形成高潮的抗日救亡文学，也得到程度不同的肯定。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重要脉络，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观来审视现代文学的确有其合理之处，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历史是复杂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单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视角审视现代文学，就会有意无意地遮蔽甚至扭曲部分历史事实。譬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视角下，自由主义文学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对于现代文学的审美结构与风格特色及它对传统的继承与突破也显得关注不够。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性视角与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的观照下，这些缺陷才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

然而，仅仅增加现代性视角与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视角，还不能实现全面的历史还原。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不仅为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历史背景，而且民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已经内化为文学的内蕴与风格。在民国视角缺失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文学脉络不仅得不到足够关注，甚而被给予有悖于历史主义的负面评价。抗战文学叙事残缺不全，一般

① 据洪亮辑录《1984—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题名一览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7期），1984—2012年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1763篇；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博士点（含一级学科）40个左右，按每个博士点每年毕业3人计算，2013—2014年约240篇博士论文通过答辩，累计总数约2000篇。

的叙述模式只说 1938 年 10 月 27 日武汉三镇失陷之前，全国文艺界掀起抗日救亡高潮，接下来便分区域叙述，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与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学，一派新天地、新人物、新风格；国统区文学揭露当局腐败，抨击日本暴行，表现民生苦难；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上海租界与香港，成为隐晦表达抗日意旨的特殊场域；沦陷区文学到 1980 年代中期才受到关注；至于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则很少提及，而且评价偏低。这样一种抗战文学叙事，怎么能够与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战场之一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相匹配呢！即使是左翼文学，由于忽略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对其复杂性与其在民国文化生态中的位置也未能做出全面而准确的阐释。

那么，为什么民国背景会被长期忽略呢？主要原因在于政治眼光代替了历史眼光，人们往往把民国仅仅理解为政府，而民国政府因为腐败不堪才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所推翻。这样一来，民国就成为一个否定对象，谈现代文学与民国的关系，主要是谈当局对现代文学的限制压迫与现代文学对当局的揭露批判。然而，实际上，民国绝不能简化为政府，民国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由先驱者抛头颅洒鲜血才终于建成，民国不管有多少新生的稚嫩、成长的扭曲，但毕竟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应该引为中国的骄傲；民国是一个国家实体，曾经为数万万中华儿女命运之所系，为世界 120 多个国家所承认；民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自然有政府，也有法律、教育、文化、文学、艺术，更有民国的经济（工业、农业、金融、商业等）、军事、外交。我们通常所说的民国，不少场合指称的是 1912 年 1 月 1 日至 1949 年 9 月 30 日这一历史时期。在将近三十八年中，中国承受了多少内忧外患，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曲折，但毕竟实现了南北统一，收回了部分被列强攫取的权益，尤其是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确立了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无论存在着多少社会弊端，有着怎样的致命缺陷，但民国毕竟是民国，袁世凯的皇帝梦被枪声所惊醒，一代枭雄在惊恐不安中一命呜呼；张勋复辟，旋即破产，徒然留下一个笑柄；法律并非尽是一纸空文，身为教育部佥事的周树人

据理力争，赢得了对教育总长的官司；经济、教育、文化、新闻出版等均有长足发展，若非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打乱了中国发展的正常秩序，中国现代化进程会取得可观的成就。

即以政府来说，也不是铁板一块，不能一概而论。1912年1月至3月为南京临时政府，时间虽短，但已呈现出万象更新的气象。1912年3月至1928年6月为北洋政府，尽管由于北洋军阀内部矛盾重重，执掌权柄者如走马灯一样变换，其间又上演过复辟的丑剧，而且百般防范、顽固抵御南方革命势力北进，但在此期间，北洋政府是国家主权的代表，事实上控制着中国大部分国土，在经济、外交、教育、文化等方面并非一无是处，否则，怎么可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经济的大发展，怎么可能有巴黎和会上中国权益的最终维护，怎么可能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怎么可能有新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新文学势如破竹，站稳脚跟，走进课堂，在文学殿堂升帐挂帅？在北洋政府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北伐战争的最终胜利可以预期的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染上了“四一二政变”的血腥，但它毕竟是北伐战争的重大成果，而且到翌年6月终于结束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并于1928年12月完成了政权的统一。1930年代中国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的发展，不能说国民政府一点积极作用没有，否则，文学园地的拓展，文学创作与翻译的丰收，《家》、《骆驼祥子》、《边城》、《故事新编》、《死水微澜》、《新月诗选》、《望舒草》、《烙印》、《大堰河》、《义勇军进行曲》、《宝马》、《且介亭杂文》、《缘缘堂随笔》、《泪与笑》、《塞上行》、《画梦录》、《雷雨》、《日出》、《上海屋檐下》等经典的问世，就无法解释。即使在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之时，国民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悄悄地进行抗战准备（如聘请德国教官训练部队，进口新式武器装备，修筑吴福线、锡澄线等高等级国防工事，成立专门机构进行抗战对策研究等）。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抗战建国的国策获得全民的共识，终于赢得了抗战胜利。国民政府的结构性缺陷到抗

战胜利后充分显露，一方面挑起内战，另一方面歪风当道，五子登科，贪腐公行，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终于在大陆彻底垮台，不得不让位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个政权最后垮台，只能说明它背弃了人民，最终为人民所唾弃，但这并不等于这个政权一开始就黑暗至极，否则，古今中外那么多王朝、国家先盛后衰又如何解释呢？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说：“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种“实录”，亦即实事求是，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我们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与叙述中应予发扬光大。把中国现代文学还原到民国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认识与叙述，不是为一个已经逝去的历史时期唱挽歌，更不是为一个已被历史证明最后失去生命力的政权唱赞歌，而是要还原民国历史文化的原生相，黑即黑，白即白，何时何处姹紫嫣红，何时何处污泥浊水。生态环境明了了，在这一环境中发生发展的现代文学生态系统才能清晰地梳理出来，丰富多彩的样貌与错综复杂的矛盾才能真实地呈现出来。这样的研究与叙述才能既无愧于历史本身与优秀传统文化，也无愧于今人与后人。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正是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发扬光大，有助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因此，我很乐于认同与支持。

2014年8月7日于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南洋公寓

代序

在与历史的对话中建立 我们的“大文学史”

李怡

五四是一个制造争论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了九十多年，但五四时代所制造的争论以及针对五四本身的争论却始终没有结束，到今天甚至还强化了起来。我初步归纳了一下，发现今人认定的“五四之罪”至少有七大宗：

少数知识分子的偏激导致了全民族文化的悲剧。

彻底反传统、割裂民族文化传统。

唯我独尊，充满了话语“霸权”。

引入线性历史发展观、激进主义的文化态度，导致了现代中国一系列文化观念上的简陋甚至迷失。

客观上应和了西方的文化殖民策略。

开启了现代专制主义特别是“文革”思维的源头。

白话取代文言，破坏了中华民族的语言流脉。

这些罪过，任何一条都可谓是空前绝后，值得打入十八层地狱，但问题

在于，拥有了如此罪过的五四却恰恰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自由思想的新时代，其种种看似大逆不道的“新”已经成为当今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五四，我们可以自由地讨论“传统”的各种弊端；因为五四，我们大规模地引进了外来文化思想，而这些思想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宽阔的世界；因为五四，我们拥有了雅俗同体、书写和口语相一致的语言方式，而且这样的方式至今依然是有效的、有力的……

看来，历史的发展总是丰富和复杂的，任何激情式的判断即便具有蛊惑人心的效果也终归无法取代历史本身的存在，何况激情之后，我们冷静思量，就会发现其中暗藏着那么多的似是而非：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真的拥有主宰他人和整个历史的“霸权”？就那么几位自己办杂志、写文章，在当时影响有限的书生？五四的激烈言辞究竟在什么范围内传播，与“文革”那种全民族自下而上、无一幸免的“运动”存在多少可比性？

这些困惑与疑问，可能不少人都有过，但是却少有人真正地、仔细地研究过，因为，陷入这些枯燥的论争话语之中，似乎并不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甚至创造社同人早就对这些“非文学”的文字表达过不屑，他们立志要推动中国文学的“第二阶段”的革新，在郭沫若等人看来，那才是属于“文学”的真正的革新。

就这样，这些似乎重要却又离“文学”甚远的无趣的言论始终得不到有效清理，以致到今天还被各方人士各取所需地任意取用，继续散布历史的迷雾。

李哲这本著作的价值正在于此。他选取了一个别人看来很可能没有什么探究内容的研究对象——五四“骂战”，在他仔细的观察和分析中，一场在许多人看来相当无益甚至无聊的“骂战”竟然具有了格外丰富的文化意味，它联系的是近现代中国文化演变、新旧文化交锋与消长的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一路读来，关于五四论争的诸多问题都得到了新的解答，而关于五四本身的论争我想也有了新的答案。

不仅如此，在我看来，这样的研究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史的追踪和清理，它同样也提醒我们一个事实：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究竟还可以有哪些可能？文学史的研究是否一定都是对文学的“纯艺术”问题的勘探？或者说只有对“纯艺术”问题的的勘探才有价值？

倡导“回到文学本身”，沉醉于“文学性”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倡议。1980年代，有感于中国文学受制于社会政治这些“文学之外”的现实，人们提出“回到文学本身”，注重“文学之内”的研究，强调“审美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代中国人觉悟到谈论文学不再等同于政治表态，也有别于道德教育、思想教育。这样的诉求既美丽，又正义，因为我们曾经的文化专制让一切关于文学的讨论都无可选择地纳入了政治表态的范畴，在这时，重申“文学”的价值，其理由不仅在于文学，更在于恢复人基本的言论权利与自由思维的权利。正是在这样一种“正义”的向度上，我坚持高度肯定这一口号的历史意义，并且主张继续研究和光大这一伦理正义的可能，对于1990年代就此的诸多批评都不予认同。但是，我们也同时发现，在当时，对于伦理正义的强烈渴求的确远远超过了对于口号内涵与学理的细致分析，比如什么是“文学”？什么又是真正的“文学本身”？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当时，在未经严格的学术追问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地将这一“文学本身”视作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赋予它某种本质性的猜想，比如文学性最终不过就是语言的艺术等等。

其实，在诸多社会问题、生存困扰纠缠不清的现代中国，美丽的语言艺术从来就不是“文学”单纯关怀的对象，在更多的时候，“文学”真的承担了更多的关注人生、参与社会问题解决的责任，这或许不是“世界文学”的理想状态，但却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真实状态。其中，包含的现代作家的体验的真实和表达的真诚，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和正视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谈论文学，更恰当的称谓应该是“大文学”，一种充满了文学艺术的目标但又容纳了更多现实责任和义务的文字形态。

“大文学”是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总体方向，它既是指一般文学作品中自然蕴含的“纯艺术”目标之外的丰富的内容，也是指其他与文学相关的理论、批评甚至思想表述的形态。这些形态也许无法用传统的“文学”文体加以定位，但是它们却在整体上构成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生存关怀、生命理想、人生信仰的一部分。它们或许相对枯燥，但也在思想的深层流淌着重大的文化关怀；它们或许不那么艺术，但却是直指当代生存的根本问题。历来争论不休的鲁迅杂文属于后者，而大量存在的关于文学和思想文化现象的讨论可能属于前者，也就是李哲的研究。

要深刻理解和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性，就有必要进入“大文学的视野”。所谓“大文学视野”就是突破对“纯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迷信，将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定位在广泛的社会历史的联系当中，将文学的趣味的精神魅力与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历史使命有机结合。显然，在诸多社会问题亟待解决的现代中国，文学毫无疑问地承担了这样的义务，并且也在事实上以这样的塑造体现自己的历史形象。

书写现代中国“大文学史”，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把对“文学”的关注融入对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格局之中，将文学的阐释之旅融通于寻找历史真相之旅。这里有现代中国政治理想的真相、经济生态的真相，也有社会文化整体发展的深刻烙印。与历史对话，将赋予文学以深度；与政治对话，将赋予文学以热度；与经济对话，将赋予文学以坚韧的现实生存品格。

在“大文学史视野”下研讨中国现代文学，就是要能够返回民国历史的现场，融入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情境，触摸民国文学机制。如何在民国历史文化的背景上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的价值，这就是我们未来研究的方向。

当然，秉持“大文学史观”，我们最终关注的还是文字的“作品”，也就是说，所有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对话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离弃文学作品，直接

讨论现代中国的历史、政治与经济。恰恰相反，进入“文学之外”，是为了最终返回“文学之内”。这里的“内”不是抽象的本质化的事物，而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文学文字本身，就是说，对所有历史文化的考察、分析并不是要确立我们新的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而是深化和完善文学作品的“阐释学”。李哲讨论五四“骂战”，依据的是五四的思想论争文字，最终要解释的也是这些文字的文化意义。他无意为现代中国的思想发展指明前进的方向，更无意在当代中国的思想运动中一较高下。进入文学的“大”范围而又不放弃我们的专业立场，进而为其他思想问题或纯粹历史问题所“诱拐”，李哲对“限度”的把握颇为准确。

李哲曾经是宋剑华教授的硕士生，在暨南大学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后来考上我的博士研究生，我们在多番的讨论中确定了这个“大文学”的论题，这几年中他为此付出了相当的努力。这一著作就是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论文答辩时评议专家和答辩专家多有褒奖，这不仅是对他几年来学术付出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我们多年来逐步探索的新的文学研究观念的某种鼓励，我个人深感欣慰。现在李哲又有机会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继续博士后研究，我想他的未来是广阔的，祝愿他继续保持诚恳踏实的学术态度，在将来取得更大的成就。

2014年8月1日于成都江安花园